

幸福倾向及其对幸福感的影响： 机制及发展^{*}

郭震 杨莹 张梦圆 寇彧

摘要: 个体追求并获得幸福的倾向可分为快乐倾向、意义倾向和投入倾向,三种幸福倾向都能显著预测幸福感。意义倾向和投入倾向通过为个体获得更多资源而提高幸福感,快乐倾向通过改善短时情绪而提高幸福感;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影响幸福倾向的形成;青少年所持有的三种幸福倾向都较低。未来研究应深入探讨环境因素与个体因素对幸福倾向的交互作用、追踪幸福倾向的发展特点、揭示幸福倾向影响幸福感的中介过程、完善幸福倾向的测量方式。

关键词: 幸福倾向 幸福感 快乐倾向 意义倾向 投入倾向

幸福倾向(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是个体追求并获得幸福的方式(Peterson et al., 2005)。个体追求并获得幸福的方式不同。有人以追求感官上的满足和愉悦而感到幸福;有人以过有意义的生活而感到幸福。然而,这中间的过程和机制尚不清楚。此外,不同幸福倾向所带来的幸福感是否存在差异,幸福倾向存在什么样的发展特点,对此人们也莫衷一是。通过分析以往研究,本文试图阐明幸福倾向影响幸福感的机制,探讨影响幸福倾向发展的因素,同时展望未来的幸福倾向研究。

一、幸福倾向的起源及测量

(一) 幸福倾向的起源

享乐论和实现论是有关如何实现幸福的两种哲学观点。享乐论认为,幸福可通过追求快乐、舒适和需要满足而得以实现,它是所有快乐时刻的总和,是伴随个体欲望满足的积极情绪状态(Diener, 2009)。与享乐论相对立,实现论认为,幸福是人们追求复杂而有意义的目标时对自己的不断完善及个人潜能的充分发挥(Deci et al., 2000; Annas, 2009)。实现论的幸福观强调,只有有意义的活动才能给人们带来愉悦体验,积极的情绪体验本身并不是幸福的核心内容,单纯以追求快乐来实现幸福是庸俗的,会使人沦为欲望的奴隶(Kashdan et al., 2008)。

心理学对幸福的研究大致包括三方面(Huta et al., 2013):一是探讨实现论的幸福观和享乐论的幸福观的主观情绪状态;二是研究不同幸福观的具体行为;三是关注追求幸福的动机状态(即幸福倾向)。实现论的幸福观和享乐论的幸福观体现在追求并获得幸福的方式上,反应了个体的不同动机状态。幸福倾向会激发个体实施与幸福观念相应的社会行为,获得快乐(Huta et al., 2010)。

彼德森等(Peterson et al., 2005)提出三种幸福倾向。其中,快乐倾向反映了享乐论的幸福观,持有快乐倾向的个体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会最大程度地体验积极情绪避免消极情绪,通过寻求即时感觉满足而获得幸福(Vella-Brodrick et al., 2008; Waterman et al., 2008);意义倾向反映

^{*} 本文是积极心理学研究基金“青少年的幸福倾向:成因及后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儿童青少年社会性能力的发展与促进”(16JJD880007)、2017 贵阳孔学堂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研究院课题“社会治理中的亲社会行为传递与亲社会心态培育”(KXTXT201704)的阶段性成果。通信作者寇彧:kouyu@bnu.edu.cn。

了实现论的幸福观,持有意义倾向的个体通过从事实现自己潜能并给生活带来意义的活动而获得幸福(Peterson et al., 2005),通过发挥潜能而成为更好的自己(Grimm et al., 2014; Huta et al., 2012);投入倾向源自“心流”(flow),持有投入倾向的个体将注意力高度集中在活动上(Csikszentmihalyi, 1990),通过感觉不到时间流逝、专注于体验活动而获得幸福(Vella-Brodrick et al., 2008)。

从与自我的关系上看,三种幸福倾向存在不同。持有快乐倾向的个体认为幸福是自我欲望的满足;持有意义倾向的个体关注自我的展现和提升,更多帮助他人;持有投入倾向的个体则会全身心投入到活动上。从时间维度上看,快乐倾向者的幸福是即时的积极感官体验;投入倾向给个体所引发的“心流”体验通常发生在活动之后(Peterson et al., 2005; Peterson et al., 2007);意义倾向所引发的快乐则更为持久,能使个体持有较长时间的幸福感(Huta et al., 2010)。

投入倾向与意义倾向更接近,都属于实现论的幸福观。个体的投入倾向和意义倾向关系密切,二者存在较高相关(Schueller et al., 2010)。因而,意义倾向和投入倾向常被合并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意义倾向和快乐倾向成为影响个体追求幸福的两种倾向(Huta et al., 2013)。

(二) 幸福倾向的测量

有两类量表常用来测量幸福倾向,包括动机状态和追求幸福的实际行为。

彼德森等(2005)编制了三维度的“幸福倾向量表”(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Scale, OTH),这是测量动机状态的代表性量表。该量表要求个体评价自己在生活中追求意义、快乐与投入的程度,然后以相对追求程度作为衡量幸福倾向的依据。OTH量表具有一定的文化普遍性(Chan, 2009; Chen et al., 2010; Ruch et al., 2010),反映了个体的一种普遍特质。

也有研究采用以人为中心的方法探讨不同人的幸福倾向类型(Kavčič et al., 2013)。依据幸福倾向,可以将人划分为四种类型:完满型(高快乐倾向、高意义倾向和高投入倾向,同时以三种幸福倾向追求幸福)、意义型(高意义倾向、低快乐倾向和中等程度的投入倾向,主要以意义倾向追求幸福)、快乐型(高快乐倾向、低意义倾向和中等程度的投入倾向,主要以快乐倾向追求幸福)、空无型(低快乐倾向、低意义倾向和低投入倾向,既不追求快乐也不追求意义和投入)。大多数成年人都至少以一种幸福倾向追求幸福,但依然有少数人属于空无型。

然而,通过回溯式自我报告笼统说明自己如何追求幸福很容易出现回忆偏差。与其说这些量表测量幸福动机,倒不如说是测量人们对待幸福的态度(Henderson et al., 2012)。也有研究对量表的效度提出质疑(Vittersø et al., 2006),认为量表中有关快乐倾向的条目(比如“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实际上反映的是冲动性(impulsivity);有关意义倾向的条目(比如“我的人生要有长久的意义”)和投入倾向的条目(“我总是能专心致志地做事情”)存在过高的社会赞许性。

胡塔等(Huta et al., 2010)编制的“享乐论和实现论活动动机量表”(Hedonic and Eudaimonic Motives for Activities Scale, HEMA)也是从动机状态来测量个体的幸福倾向。该量表通过被试在代表快乐倾向(“寻求享受”)和意义倾向(“寻求最好的自我”)的条目上所做出的7点评分来比较其动机的相对程度,其特点是通过不同的指导语来测定个体的特质性幸福倾向(比如“你的日常活动在多大程度上与下列目的相近”)或状态性幸福倾向(比如“你当前/今天/过去一周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与下列目的相近”)。HEMA量表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东西方的不同文化背景下都获得了验证(Anic, 2014; Asano et al., 2014; Bujacz et al., 2014)。

也有研究通过考察人们与不同幸福倾向有关的具体行为来确定其幸福倾向。斯蒂格等(Steger et al., 2008)将个体的日常行为划分为“快乐倾向活动”(比如喝酒、看电影等)与“意义倾向活动”(比如志愿活动、表达感谢等)。据此分类罗列行为核查表,让被试自主报告自己一段时间内的活动频率。这样,既可以通过某一天的特定类别活动频率来测量人们幸福倾向的状态水平,也可以通过一段时间内不同活动频率的求和来测量幸福倾向的特质水平。这一方法看起来更具有生态效度。但是,这些活动是否能切实反映个体追求幸福的动机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三) 青少年的幸福倾向

青少年的幸福倾向具有年龄特殊性。在 13-18 岁的青少年中,幸福倾向为“空无型”的比例为 23%(Yang et al., 2017)。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成人,青少年的认知发展尚未成熟,看待问题的方式更为盲目,不能形成明确追求幸福的方式(林崇德、李庆安, 2005)。青少年时期处于向成人过渡的关键时期,会经历一系列质的发展与变化(比如社交圈的扩大、认知的成熟等)(Fu et al., 2014)。这些都有可能影响青少年的幸福倾向,导致“空无型”的人数比例高于成人群体。

青少年的幸福倾向还表现出文化差异性。比如,阿根廷青少年持有快乐倾向的水平显著高于意义倾向(Góngora et al., 2014)。一方面,这可能是因为生理发育使得青少年更关注即时刺激与快乐(Verkasalo et al., 2006);另一方面,这也同阿根廷文化更重视当前的愉悦体验有关(Góngora et al., 2014)。而中国青少年在快乐倾向和意义倾向上并没有显著差异,这可能同中国文化更强调人际关系和谐、提倡个人对社会的奉献等有关,而这样的文化价值观与意义倾向更为一致。可见,在追求快乐的同时,中国的青少年也被培养成持有较高水平的意义倾向(Yang et al., 2017)。

幸福倾向会使个体实施与目标相一致的行为,获得幸福感(Fowers et al., 2010)。持有意义倾向的青少年会投入更多给自身带来意义幸福感的行为(比如积极的亲社会行为);而持有快乐倾向的青少年可能会从事更多纯享乐的、适应不良的行为(比如网络成瘾)(Yang et al., 2017)。

二、幸福倾向影响幸福感的机制

不同的幸福倾向都能促进幸福感(Huta, 2016; Ruch et al., 2010; Vella-Brodrick et al., 2008)。快乐倾向、意义倾向和投入倾向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呈较高的正相关,与消极情感呈负相关(Park et al., 2009; Peterson et al., 2005)。一项干预研究将 218 名成人被试随机分配到四个干预组(快乐倾向、意义倾向、投入倾向以及三种倾向的结合)和一个对照组中,干预组被试要在一周内每天写下令自己感到愉悦/有意义/全身心投入/既愉快、有意义而又全身心投入的三件事;对照组被试每天要写下当天发生的三件事情。结果发现,干预组被试的幸福感受相对于对照组获得显著提升(Giannopoulos et al., 2011)。

相对于快乐倾向,意义倾向和投入倾向得分高的个体报告了更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Chan, 2009; Ortner et al., 2018; Park et al., 2009; Peterson et al., 2005; Vella-Brodrick et al., 2008);甚至在控制了性格优势(character strength)后,意义倾向和投入倾向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依然更强(Buschor et al., 2013)。追求意义和投入的个体比追求快乐的个体报告了更高水平的主客观幸福感;虽然三种倾向都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但意义倾向和投入倾向与客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快乐倾向与客观幸福感呈负相关(Schueller et al., 2010)。意义倾向不仅直接影响个体自身的幸福感,也会影响其重要他人(朋友和亲属)的幸福感;而快乐倾向则无此影响(Huta et al., 2012)。在负性情绪方面,一项研究采用 HEMA 量表测量个体的快乐和意义倾向,发现意义倾向而非快乐倾向与紧张、压力负相关(Kryza-Lacombe et al., 2018)。还有追踪研究探讨了这一过程的脑神经基础,发现与意义倾向决策相关的腹侧纹状体激活更强的青少年一年后抑郁症状显著下降,而与快乐倾向决策相关的腹侧纹状体激活更强的青少年抑郁症状显著上升(Telzer et al., 2014)。

从建构资源的角度,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解释了意义倾向和投入倾向为什么对幸福感的作用更强;从快乐只能带来短期情绪改善的角度,享乐适应预防模型(hedonic adaptation prevention model, HAP)探讨了快乐倾向为什么不能改善个体持续的幸福感受。这两种理论视角互为补充,揭示了幸福倾向影响幸福感的机制。

(一) 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的视角

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Fredrickson, 2004)认为,积极情绪和资源(resources)形成了相互关联的积极反馈回路;积极情绪帮助个体持久地建构心理和社会资源,这些资源反过来又促进了个

体情绪的改善。意义倾向和投入倾向之所以给个体带来持续好处,是因为它们给人们建构了持久的资源;而快乐倾向只是带来了短期的情绪改善。

意义倾向有助于个体建立社会联系和提供人生目的,进而发展出与自我相关的目标。比如,追求意义的青少年有更良好的学习行为(石霞飞等,2015)和更高的学业成就(Kryza-Lacombe et al., 2018)。在意义倾向的影响下,青少年学习更投入、学习策略更多样化、学习毅力更强。另一项研究发现,意义倾向促进青少年从事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进而提高他们的幸福感(Yang et al., 2017)。相对于追求快乐的个体来说,追求意义的个体具有更强的情绪调节能力;而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力正是个体为了获得更多幸福感所建构的资源之一(Ortner et al., 2018)。投入倾向也是如此,它有助于个体发挥自身才能、挖掘自己的兴趣、获得更多的心理资本,从而获得幸福(Hunter et al., 2003)。

投入倾向使个体全身心专注于某一活动,增强个体的能力感和自尊,而这些恰好是生活满意度提高的基础(San Martín et al., 2010)。而快乐倾向不会导致任何持久资源的开发,它所带来的只是短期的情绪改善(Anic, 2014)。甚至还有研究发现,快乐倾向与青少年的网络成瘾相关(Yang et al., 2017)。如果不同意义及投入相结合,那么即时快乐需求并不能给个体带来实质性的资源建构。投入倾向和意义倾向则可使个体通过建立技能和心理资源来实现有价值的目标。

(二) 享乐适应预防模型的视角

享乐适应预防模型(Sheldon et al., 2012)认为,很多积极事件(比如买车)所带来的幸福感都是短暂的。按照自下而上的加工程序,人们第一次买车的时候会很高兴,而第二次再买时就不会那么高兴了;按照自上而下的加工程序,个体对积极事件的期望会越来越高,第一次买辆便宜的车会很高兴,而第二次则要买辆贵的车才会高兴。无论采用哪种程序,单纯追求快乐的积极事件对个体幸福感的提升都不会长久。

尽管如此,追求快乐并非没有幸福感。不同幸福倾向给不同个体带来不同幸福感。同时拥有三种幸福倾向的个体,幸福感最高(Huta et al., 2010; Peterson et al., 2005; Peterson et al., 2007; Schueller et al., 2010)。每一种倾向都会影响个体的幸福感,但它们的影响时效及机制不同。

三、幸福倾向的发展

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都影响幸福倾向的发展。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宏观层面的文化因素及微观层面的父母、同伴等因素;个体因素主要包括人格及决策风格(decision-making style)等因素。

(一) 环境因素

文化从宏观层面上影响人们对幸福的定义,进而影响人们追求幸福的方式。在集体主义的文化环境下,幸福的概念往往与社会参与活动密切相关(比如人际关系和谐等),因此处于集体主义文化地区(比如东亚)的个体会通过更多的社会参与来追寻幸福(Oyserman et al., 2002)。跨文化研究发现,中国人的幸福更为社会取向,更强调精神的充实而非享乐的满足,更注重个体角色的责任和义务;而美国人的幸福则更为个体取向,更强调追求个体利益,更注重外在的明确目标(Luo et al., 2004)。一项研究测量了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27个国家被试的幸福倾向,发现各个国家被试的幸福倾向各不相同(Park et al., 2009)。这表明,文化确实与人的幸福倾向息息相关。但这些研究并没有深入探讨文化是如何作用于幸福倾向的。未来可研究具体的文化变量对幸福倾向的影响,比如宗教信仰、传统儒家文化等可能影响人们对幸福的理解。

从微观层面看,社会支持塑造了个体对不同目标的追求(Grotevant, 1987)。父母为个体追求不同的目标提供了认知、情感和物质资源(Moran et al., 2012)。有研究(Huta, 2011)让被试回忆成长过程中父母的行为,发现如果父母采取高要求高反应的教养方式,子女在意义倾向上的得分更高,但父母教养方式与子女的快乐倾向无关;无论父母是在口头上支持快乐或意义倾向,还是在行

动中追求快乐或意义,子女都会受其影响表现为快乐或意义倾向。未来研究应更加系统化地探讨父母影响子女幸福倾向的动态过程(比如,子女追求幸福的特点是否会影响到父母改变教养方式;父母的心理控制是否会使子女表现出更多的追求快乐等等)。

群体社会化理论认为,同伴对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Harris,1995)。同快乐倾向类似,物质主义价值观主张幸福感来自于直接的财物获得(Richins et al.,1992)。同伴拒绝会使青少年表现出更高层次的物质主义(Jiang et al.,2015);而同伴支持则会预测青少年的亲社会目标追求(Wentzel,1998)和对学业的重视程度(Vitoroulis et al.,2012)。尽管尚未有研究直接探讨同伴对个体幸福倾向的影响,但从现有对相近变量的研究来看,同伴会影响个体的幸福倾向。

(二) 个体因素

不同人格特征的个体会基于不同的情境及生活经验来获得幸福(Strobel et al.,2011)。外向性个体对各种积极刺激事件反应灵敏,与意义倾向、快乐倾向和投入倾向都呈正相关;而诚实-谦逊(honesty-humility)的个体则对外在财富、社会地位不感兴趣,与快乐倾向负相关(Pollock et al.,2015)。有研究把不同人格特质合成为代表积极人格特质(更高的宜人性、外向性,更低的神经质)的总分,发现积极的人格特质与个体的快乐倾向和投入倾向相关(Hirschi,2011)。

性格优势也促使个体更好地思考如何追寻幸福。无论是同伴评定的还是自我报告的性格优势都与个体的幸福倾向正相关,希望、爱、好奇等性格优势与幸福倾向的关系尤其密切(Buschor et al.,2013; Peterson et al.,2007)。由此可以推测,其他一些积极的人格特质也会影响个体的幸福倾向。比如,强调个体坚持努力以及兴趣一致的坚毅性人格(grit)可能会使个体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更为注重投入和意义。

幸福倾向也受决策风格的影响。时间透视(temporal perspectives)和最大化原则(maximizing principle)是决策风格的重要指标。时间透视指决策时是更愿意牺牲现在考虑未来,还是只关注当下需求的满足,包括现在关注和未来关注两个维度。最大化原则与满意原则相对。最大化原则是实现最理想的结果,满意原则是选择满足自己需要但不太理想的结果。研究发现,未来关注和意义倾向、投入倾向正相关;而现在关注则与二者负相关,但与快乐倾向正相关(Bubić et al.,2016)。可见,关注未来的个体更可能将当下的牺牲作为对未来的投资,进而实现更有意义的长期目标;最大化原则与三种幸福倾向都正相关,秉持最大化原则的人会努力争取在生活中各个方面都做到最好。但是,这项横断研究并未很好地揭示出这些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人们对获取幸福方式的认识也会影响决策时的关注点。未来研究还需进一步考察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

四、未来研究展望

幸福倾向对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 深入探讨环境因素与个体因素对幸福倾向的交互作用

有研究探讨了环境因素与个体因素对幸福倾向的影响,但它们并未揭示出这些因素影响幸福倾向的机制,也未考察它们的共同作用过程。

意义倾向和投入倾向的形成需要父母更多教养投入,而快乐倾向的形成则更多受个体自身因素的影响(Huta,2011)。追求意义和投入同个体付出的努力及人格特质有关(Huta,2014);快乐倾向也不单只受个体因素的影响(van Auken et al.,2014);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国青少年更容易形成物质主义价值观(Ku,2015; Shek et al.,2014)。可见,社会环境会通过影响个体的价值观进而影响其幸福倾向。从青少年的成长过程看,父母与同伴的影响也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Steinberg et al.,1986)。

总之,无论是宏观的社会环境还是微观的学校、家庭环境,都能够影响个体的生活经历、人格与

价值观的形成,进而影响个体的幸福倾向。未来研究应综合考察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深入探讨幸福倾向的成因及其影响机制。

(二) 追踪幸福倾向的发展特点

青少年幸福倾向的发展受其年龄特征的影响。比如,处于青少年和成年初期的个体要比成人具有更高的感觉寻求倾向(Arnett, 1994);他们追求多变、新异、强烈的感觉体验需求更强(Romer et al., 2007; Steinberg et al., 2008),因此可能会更多地选择快乐倾向来追求幸福。

相对于成人来说,青少年也更为自我中心,对自我的关注较高(Harter, 1999);而意义倾向则强调良好的人际关系及对周围世界的关注(Peterson et al., 2007; Sirgy, 2012)。因此,青少年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才逐渐出现意义倾向。此外,青少年幸福倾向的性别差异也值得研究。相对于男生,女生更为注重外表吸引力这种更加直接的幸福目标(Fu et al., 2018);但也有研究发现,女性要比男性更为重视和追求成长、人际归属和社会责任等内在目标(Morgan et al., 2013)。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阐明幸福倾向的性别特征,以及性别和年龄的交互作用。

以人为中心考察青少年幸福倾向类型的发展轨迹也很有必要。比如,“空无型”如何向其他类型的幸福倾向转化,何时是转化的关键时期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三) 揭示幸福倾向影响幸福感的中介过程

幸福倾向通过建构资源影响个体的幸福感,但直接探讨这一中介过程的研究还比较少。有研究发现(Yang et al., 2017),亲社会行为在意义倾向对幸福感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变量能够作为建构的资源在幸福倾向与幸福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呢?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认为,自主、关系和胜任是个体的三种基本需要,它们的满足能使个体获得幸福感(Deci et al., 2000; Ryan et al., 2000)。所以,当通过强调人际关系、自我成长和专注的意义倾向和投入倾向来获取幸福时,个体会更容易满足自身的基本心理需要、建构相应的心理资源,从而获得幸福;而快乐倾向与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之间的关系较弱。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追踪探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幸福倾向与幸福感之间的作用。

青少年时期的重要任务是建立自我认同,形成对自我稳定的认知。个体对未来的明确规划是形成自我认同的资源(Burrow et al., 2011),而对意义和投入的追求可以帮助个体拥有清晰的目标,从而建构个体自我认同的相关资源,进而促进心理健康与幸福感的获得。自我认同也有可能幸福倾向与幸福感之间具有中介作用,这同样需要进一步探讨。

(四) 完善幸福倾向的测量方式

有关幸福倾向的大多数研究都是通过问卷法完成的。OTH量表测量了快乐倾向、意义倾向和投入倾向这三个维度,HEMA量表测量了快乐倾向和意义倾向这两个维度。关于OTH量表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意义倾向和投入倾向之间存在较大重叠(Schueller et al., 2010)。所以,未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确定幸福倾向的维度。

幸福倾向的测量工具大多是基于西方社会的个体主义文化而编制的。在中国被试群体中,OTH量表已获得验证(Chen et al., 2010; Yang et al., 2017)。尽管如此,集体主义文化下的幸福观念要更为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周围环境的联结等(Li, 2009)。所以,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寻求亲密关系也可能同幸福有关。因而,编制适合中国文化的幸福倾向测量工具也十分必要。

此外,通过问卷法测量幸福倾向的一些弊端也值得注意。为了避免由自我报告所带来的有关幸福态度的测量、社会赞许性等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采取内隐实验范式或行为观察的研究范式;也可以通过访谈法、追踪法来探讨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群体的幸福倾向的基本特征。

参考文献:

- 林崇德、李庆安 2005,《青少年期身心发展特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石霞飞、王芳、左世江 2015,《追求快乐还是追求意义? 青少年幸福倾向及其对学习行为的影响》,《心理发展与教育》第5期。
- Anic, P. 2014, "Hedonic and Eudaimonic Motives for Favourite Leisure Activities." *Applied Psychology* 7(1).
- Annas, Julia 2009, "Feeling Good and Functioning Well: Distinctive Concepts in Ancient Philosophy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4(3).
- Arnett, J. 1994, "Sensation Seeking: A New Conceptualization and a New Scale."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6(2).
- Asano, R. et al. 2014, "The Hedonic and Eudaimonic Motives for Activities (HEMA) in Japan: The Pursuit of Well-being."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85(1).
- Bubić, A. et al. 2016, "The Role of Decision Making Styles in Explaining Happines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9(1).
- Bujacz, A. et al. 2014, "Measuring Hedonia and Eudaimonia as Motives for Activities: Cross-national Investigation through Traditional and Bayesia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5.
- Burrow, A. L. et al. 2011, "Purpose as a Form of Identity Capital for Positive Youth Adjustmen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7(4).
- Buschor, C. et al. 2013, "Self- and Peer-rated Character Strengths: How do They Relate to Satisfaction with Life and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8(2).
- Chan, D. W. 2009,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Chinese Prospective and in-service Teachers in Hong Kong."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9(2).
- Chen, Guo Hai 2010, "Validating the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Scale in a Chinese Sampl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9(3).
- Csikszentmihalyi, M. 1990,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Deci, E. L. et al. 2000, "The 'What' and 'Why' of Goal Pursuits: Human Needs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Behavior." *Psychological Inquiry* 11(4).
- Diener, E. (ed.) 2009, *Subjective Well-being* (Vol. 37). New York: Springer.
- Fowers, B. J. et al. 2010, "Constitutive and Instrumental Goal Orientation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Eudaimonic and Hedonic Well-being."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5(2).
- Fredrickson, B. L. 2004,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B: Biological Sciences* 359(1449).
- Fu, Xinyuan, Y. Kou & Y. Yang 2014, "Materialistic Values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Effects of Parental Rejection and Self-esteem." *Child & Youth Care Forum* 44(1).
- Fu, Xinyuan, X. Liu, Y. Yang, M. Zhang & Y. Kou, 2018, "The Role of Relative Intrinsic Aspirations in Chinese Adolescents' Prosocial Behaviors." *Youth & Society* 50(1).
- Giannopoulos, V. L. et al. 2011, "Effects of Positive Interventions and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6(2).
- Góngora, V. C. et al. 2014, "Well-being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Argentinea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17(9).
- Grimm, C. et al. 2014,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and the Experience of Everyday Activities."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0(3).
- Grotevant, H. D. 1987, "Toward a Process Model of Identity Formation."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2(3).
- Harris, J. R. 1995, "Where is the Child's Environment? A Group Socialization Theory of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102(3).
- Harter, S. 1999,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lf: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Henderson, L. et al. 2012, "Integrating the Hedonic and Eudaimonic Perspectives to More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Wellbeing and Pathways to Wellbe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ellbeing* 2(3).
- Hirschi, A. 2011, "Effects of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on Vocational Identity Achievement." *Career Development*

- Quarterly 59(4) .
- Hunter ,J. P. et al. 2003, “The Positive Psychology of Interested Adolescents. ”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2(1) .
- Huta , V. 2011, “Linking Peoples’ Pursuit of Eudaimonia and Hedonia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Parents: Parenting Styles , Verbally Endorsed Values , and Role Modeling. ”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3(1) .
- 2014, “Eudaimonia. ” In S. A. David et al. (eds.)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Happin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6, “Eudaimonic and Hedonic Orientations: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Research Findings. ” In J. Vittersø (ed.) , *Handbook of Eudaimonic Well-Being* .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Huta , V. , L. G. Pelletier , D. Baxter & A. Thompson 2012, “How Eudaimonic and Hedonic Motives Relate to The Well-being of Close Others. ”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7(5) .
- Huta , V. & R. M. Ryan 2010, “Pursuing Pleasure or Virtue: The Differential and Overlapping Well-being Benefits of Hedonic and Eudaimonic Motives. ”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1(6) .
- Huta , V. & A. S. Waterman 2013, “Eudaimonia and its Distinction from Hedonia: Developing a Classification and Terminology for Understanding Conceptual and Operational Definitions. ”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5(6) .
- Jiang , Jiang et al. 2015. “Can’t Buy Me Friendship? Peer Rejection and Adolescent Materialism: Implicit Self-esteem as a Mediator. ”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58.
- Kashdan , T. B. et al. 2008, “Reconsidering Happiness: The Costs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Hedonics and Eudaimonia. ”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3(4) .
- Kavčič , T. et al. 2013, “Happiness and Pathways to Reach It: Dimension-centred Versus Person-centred Approach. ”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8(1) .
- Kryza-Lacombe , M. et al. 2018, “Hedonic and Eudaimonic Motives: Associations with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Negative Emotional States among Urban College Students. ”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 Ku , L. 2015, “Development of Materialism in Adolescence: The Longitudinal Role of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Chinese Youths. ”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24(1) .
- Li , X. 2009, “An Empirical Study on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Government Employee in China. ” *Canadian Social Science* 4(2) .
- Luo , L. et al. 2004 “Culture and Conceptions of Happiness: Individual Oriented and Social Oriented SWB. ”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5(3) .
- Moran , S. et al. 2012 , “How Supportive of Their Specific Purposes Do Youth Believe Their Family and Friends Are?”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28(3) .
- Morgan , J. et al. 2013, “Intrinsic Aspirations and Personal Meaning across Adulthood: Conceptual Interrelations and Age/ Sex Differences. ”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9(5) .
- Ortner , C. N. M. et al. 2018, “The Roles of Hedonic and Eudaimonic Motiv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20.
- Oyserman , D. et al. 2002, “Rethink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Evaluation of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Meta-analyses. ”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1) .
- Park , N. et al. 2009,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Twenty-seven Nations. ”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4(4) .
- Peterson , C. , N. Park & M. E. P. Seligman 2005,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Full Life versus the Empty Life. ”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6(1) .
- Peterson , C. , W. Ruch , U. Beermann , N. Park & M. E. P. Seligman 2007, “Strengths of Character ,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 and Life Satisfaction. ”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3) .
- Pollock , N. C. et al. 2015, “Do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Mediat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7(2) .
- Richins , M. L. et al. 1992, “A Consumer Values Orientation for Materialism and its Measurement: 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3) .
- Romer , D. et al. 2007, “A Biosocial-affect Model of Adolescent Sensation Seeking: The Role of Affect Evaluation and Peer-group Influence in Adolescent Drug Use. ” *Prevention Science* 8(2) .

- Ruch, W. et al. 2010, "Ways to Happiness in German-speaking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6(3).
- Ryan, R. M. et al. 2000,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1).
- San Martín, J. et al. 2010, "Life Satisfaction and Perception of Happines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Span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3(2).
- Schueller, S. M. et al. 2010, "Pursuit of Pleasure, Engagement, and Meaning: Relationships to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Measures of Well-being."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5(4).
- Shek, D. T. et al. 2014, "The Chinese Adolescent Materialism Scal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and Normative Profil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Disabili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13(2).
- Sheldon, K. M. et al. 2012, "The Challenge of Staying Happier: Testing the Hedonic Adaptation Prevention Mode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8(5).
- Sirgy, M. J. 2012, *The Psychology of Quality of Life: Hedonic Well-being, Life Satisfaction, and Eudaimonia*. Dordrecht: Springer.
- Steger, M. F. et al. 2008, "Being Good by Doing Good: Daily Eudaimonic Activity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2(1).
- Steinberg, L., D. Albert, E. Cauffman, M. Banich, S. Graham & J. Woolard 2008, "Age Differences in Sensation Seeking and Impulsivity as Indexed by Behavior and Self-report: Evidence for a Dual Systems Model."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4(6).
- Steinberg, L. & S. B. Siverberg 1986, "The Vicissitudes of Autonomy in Early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57(4).
- Strobel, M. et al. 2011, "Be Yourself, Believe in Yourself, and Be Happy: Self-efficacy as a Mediator between Personality Factor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52(1).
- Telzer, E. H. et al. 2014, "Neural Sensitivity to Eudaimonic and Hedonic Rewards Differentially Predict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over Tim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18).
- van Auken, S. et al. 2014, "Assessing Materialism among The Future Elites of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nsumer Marketing* 26(2).
- Vella-Brodrick, D. A. et al. 2008, "Three Ways to Be Happy: Pleasure, Engagement, and Meaning-Findings from Australian and US Sampl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0(2).
- Verkasalo, M. et al. 2006, "Values Following a Major Terrorist Incident: Finnish Adolescent and Student Values before and after September 11, 2001."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6(1).
- Vitoroulis, I. et al. 2012, "Perceived Parental and Peer Support in Relation to Canadian, Cuban, and Spanish Adolescents' Valuing of Academics and Intrinsic Academic Motivatio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3(5).
- Vittersø, J. et al. 2006, "Why Can't We Measure Engagement with Life Satisfaction Scales? Som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rguments about Their Distinctivenes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e 3rd European Conference on Positive Psychology. Braga, Portugal.
- Waterman, A. S. et al. 2008, "The Implications of Two Conceptions of Happiness (Hedonic Enjoyment and Eudaimonia)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9(1).
- Wentzel, K. R. 1998,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Motivation in Middle School: The Role of Parents, Teachers, and Peer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0(2).
- Yang, Y., P. Li & Y. Kou 2017,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ese Adolescents."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10(4).
- Yang, Y., P. Li, X. Fu & Y. Kou 2017,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Roles of Prosocial Behavior and Internet Addictive Behavior."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8(6).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郭震、张梦圆、寇彧)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杨莹)
责任编辑: 王兵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and its Influence on Well-being: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 *Guo Zhen , Yang Ying , Zhang Mengyuan & Kou Yu(1)*

Abstract: For the individuals , the tendency to seek and achieve happiness could be divided into orientation to pleasure , orientation to meaning and orientation to engagement. All these three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could predict well-being significantly. Through achieving more resources for individuals , the orientation to meaning and orientation to engagement could increase their well-being; whereas through improving short-term emotion for individuals , the orientation to pleasure could increase their well-being.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individual factors could influence the formation of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for the adolescents , the three types of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are relatively low. The future study should emphasize the following aspects: deeply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individual factors on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tracking th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 in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revealing the mediating process in the influence of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on well-being; improving the methods of measuring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Keywords: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Well-being Orientation to Pleasure Orientation to Meaning Orientation to Engagement

The Social Emotion of Floating Young Women in Mega City's Settlement Area

..... *Li Sheng & Zhao Jingya(10)*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regardi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settlement area in Beijing , this paper tries to study the floating young women's characteristic condition of social emotion in two dimensions , namely "positive social emotion" and "negative social emotion". By using the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 we try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each influencing factor.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 the young floating women's social emotion could be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economic level , marriage and family , labor condition and social perception , etc. For young floating women with higher economic level and better social perception ,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generate positive social emotion; whereas higher labor intensity and entry into marriage and family are more likely to generate negative social emotion. On the whole , for the young floating women in Beijing area , the social emotion doesn't only display negative state. However , we should continually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ir complex social mentality ,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existence of positive social emotion and negative social emotion.

Keywords: Floating Young Women Social Emotion Beijing Area

The Pathways in the Formation of Differences in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d its Mechanisms

Jiao Kaishan , Yu Xiaohan & Jin Miao(21)

Abstract: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fferences in mental health among college students from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status , and the influencing pathways and mechanisms of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status; the social capital and self-efficacy are two important mediating factors. This could further confirm that mental health status is the result of a combination of socio-economic factors and mental mechanisms. In order to prevent and intervene the de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 we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the cognitive and mental mechanisms behind ,but also consider the factors including college